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

沈阳¹

摘要：在新时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浙江省通过多年的探索和积累，形成了以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象山“村民说事”经验以及安吉“余村经验”等为代表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主要特点在于浙江省从上到下政治上的坚定性、治理上的创新性以及行动上的群众性。浙江乡村治理经验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的夯实了农村的基层基础，通过提高基层乡村治理水平保障了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业进步、农村美丽、农民幸福。

关键词：浙江乡村治理经验；三治融合；小微权力清单；村民说事；余村经验

中图分类号：D422.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20) 01—0089—008

DOI:10.16072/j.cnki.1243d.2020.01.0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等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大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要实施七大战略之一的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新时代要加强乡村治理的探索和创新，才能够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近年来，浙江省积极探索、发展和创新乡村治理，形成了别具特色、独有风格的浙江乡村治理经验，为全国范围内开展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例

2019 年 6 月 5 日，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举行乡村治理专题新闻发布会，首批 20 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在会上发布。^②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首批 20 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中浙江省就有 3 个，分别是桐乡市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宁海县小微权力清单“36 条”和象山县的村民说事。除此之外，浙江省安吉县的“余村经验”等，也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乡村治理先进典型经验。浙江省的乡村治理走在了时代前列、全国前沿，逐步形成了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典范，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农村的生动实践。

¹收稿日期：2019—10—23

作者：沈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建设与治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邮编：100732

²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 页.

³ ② 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首次发布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J]. 农村工作通讯，2019(13)，第 31—32 页.

（一）桐乡“三治融合”经验

1、桐乡市的地理位置状况。桐乡市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腹地。该市东依杭州湾，南邻杭州，西靠莫干山，北接太湖、苏州，距上海 130 余公里，居于沪、杭、苏金三角中间地带。桐乡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嘉兴市。

2、桐乡“三治融合”经验的缘起。桐乡“三治融合”经验要从隶属于桐乡市的作为国际旅游区的乌镇说起。随着乌镇旅游的火热，相伴而生的是一批不规范的家庭旅馆。这些家庭旅馆虽然留住了旅游的背包客，但是因管理跟不上而产生的诸如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投诉也比较多。面对这种情况，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通过加强指导、典型引导等，促进了乌镇旅游业的自治。2013 年 5 月，“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乌镇旅馆业进入了“自治”时代。民宿行业协会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乌镇人家”。入会的家庭旅馆可以共享“乌镇人家”这个品牌，同时必须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协会组织不定期检查，严厉处罚不合格的经营者，维护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增强了游客的认同感。

3、桐乡“三治经验”的发展和完善。乌镇旅游业自治经验开了先河，桐乡市委、市政府顺势引导，加强顶层设计，开展整体推进，最终形成了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在基层先期探索的基础上，桐乡市加强领导，全面总结，逐步发展和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乡村治理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经验重视顶层和整体制度设计，先后出台了多达 18 项的长效管理规范工作机制，织密了乡村治理的管理网络。桐乡市把这一经验全面推广，覆盖了辖区内全部行政村，产生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①的乡村治理实效。

为了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桐乡市还充分发挥了百姓议事会、百姓参政团、百事服务团、村民法治驿站、乡贤参事会、道德评判团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基层农村的生动实践。

（一）桐乡“三治融合”经验

1、桐乡市的地理位置状况。桐乡市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腹地。该市东依杭州湾，南邻杭州，西靠莫干山，北接太湖、苏州，距上海 130 余公里，居于沪、杭、苏金三角中间地带。桐乡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嘉兴市。

2、桐乡“三治融合”经验的缘起。桐乡“三治融合”经验要从隶属于桐乡市的作为国际旅游区的乌镇说起。随着乌镇旅游的火热，相伴而生的是一批不规范的家庭旅馆。这些家庭旅馆虽然留住了旅游的背包客，但是因管理跟不上而产生的诸如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投诉也比较多。面对这种情况，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通过加强指导、典型引导等，促进了乌镇旅游业的自治。2013 年 5 月，“乌镇人家”民宿行业协会成立，乌镇旅馆业进入了“自治”时代。民宿行业协会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和管理制度，创建了自己的品牌“乌镇人家”。入会的家庭旅馆可以共享“乌镇人家”这个品牌，同时必须遵守协会的规章制度。协会组织不定期检查，严厉处罚不合格的经营者，维护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增强了游客的认同感。

3、桐乡“三治经验”的发展和完善。乌镇旅游业自治经验开了先河，桐乡市委、市政府顺势引导，加强顶层设计，开展整体推进，最终形成了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在基层先期探索的基础上，桐乡市加强领导，全面总结，逐步发展和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乡村治理经验。桐乡“三治融合”经验重视顶层和整体制度设计，先后出台了多达 18 项的长效管理规范工作机制，织密了乡村治理的管理网络。桐乡市把这一经验全面推广，覆盖了辖区内全部行政村，产生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①的乡村治理实效。

为了更好地完善和发展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桐乡市还充分发挥了百姓议事会、百姓参政团、百事服务团、村民法治驿

^① 姚媛. 三治融合“桐乡经验”的启示与理论创新——基于乡村治理的视角 [J]. 领导科学论坛, 2019(9), 第 20—23 页.

站、乡贤参事会、道德评判团等的综合治理、全面协调作用。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注重依靠自治来消除村民内部矛盾，依靠法治来解决村民纠纷和止息争吵，依靠德治来发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全面提高村民素质。这样，就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为核心内容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格局。

4、桐乡“三治融合”经验的新时代实践价值。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是乡村治理机制在基层农村的创新性经验，是新时代基层乡村治理创新发展的前进方向。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基层乡村治理实践当中，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桐乡“三治融合”经验通过自治机制释放了乡村基层的发展活力，通过法治管理把法治思维传送到村民心中，通过德治建设在乡村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桐乡市，通过“三治融合”，天蓝了、云白了、山青了、水绿了、村美了、民富了，干群关系密切、乡村和谐发展、村民安居乐业。

（二）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

1、宁海县的地理位置状况。宁海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在浙江省的东部、宁波市的南部沿海，处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居天台山和四明山脉交汇处。东临象山县，南界台州市三门县，西靠台州市天台县、绍兴市新昌县，北接奉化区。宁海县是浙江省宁波市市辖县。

2、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的缘起。早在 2014 年之前，宁海县乡村治理工作困难重重，农村基层党组织不强，党群干群关系不顺，村民信访上访不断，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乡村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伴随着 2014 年初浙江省开始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宁海县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施精细化的乡村治理权力清单制度。宁海县经过多次梳理和发展完善，出台了《宁海县村级权力清单 36 条》，形成了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制度。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宁海县总结形成了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

3、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的具体内容。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既包括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 19 条集体管理事项，还包括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等 17 条便民服务事项，这 36 条基本涵盖了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行使村务权力的全部内容^⑤。

4、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的新时代实践意义。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按照“全面清权、标准配权、公开晒权、按图行权、依法制权”这五个层次依次推进，构建起了农村小微权力规范化、法治化运行体系。小微权力清单制度重点关注乡村治理中的“小微权力”，把这些村级“小微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形成了具有制度约束力的乡村治理经验。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把农村的“小微权力”作为监督重点，提高了村民自治水平，优化了服务群众的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公开透明。

（三）象山“村民说事”经验

1、象山县的地理位置状况。象山县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居长三角地区南缘，在象山港与三门湾之间，两港相拥，三面环海，西接宁海县。因县城西北有山“形似伏象”，故名象山。象山县由象山半岛东部及沿海 608 个岛礁组成。象山县是浙江省宁波市市辖县。象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催生了与其地域特点相适应的“村民说事”经验。

2、象山“村民说事”经验的源起。象山“村民说事”源起于象山县西周镇杰下村。2009 年该村得到白溪水库引水工程补偿款 1000 余万元，成了“村民说事”的引线。这笔钱在村里引出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当时各种猜忌和谣言蜂拥而起。有些人认

⁵ ①黄晓.小微权力清单：乡村有效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升级宁海“36 条”实践的分析[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9(3),第98—106页.

为“村干部私吞了补偿款”；有些人认为“补助款资金分配不均”；还有些人认为“这个项目的补助款要全部分掉”等等。伴随而生的就是村民对村干部的极度不信任，对于村干部的话，不愿意听不肯相信。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郑祖法心痛不已。也正是这种复杂的剧烈的社会变动，促使当时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下定决心要让村民来讨论和决定这件事情。由此，“村民说事”应运而生。

3、象山“村民说事”经验的制度化。“村民说事”包括“村民说事、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事民评”等四个环节。象山县委、县政府积极肯定基层乡村治理的创新性做法，不断总结辖区内出现的“村民说事”这种新的乡村治理经验，从而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村民说事”制度。后来在此项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和谐村庄、实惠居民”为宗旨的“和村惠民四步法”。象山县委、县政府于2010年、2012年、2013年先后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全县推行“村民说事”制度的通知》《关于在全县推行“村务会商”制度的通知》以及《关于在全县推行“民事村办”制度的通知》，逐步推出和循序形成了“村民说事”“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事民评”等一系列制度，概括起来总称为“和村惠民四步法”，推行全县，带动全市，影响全省，点亮全国。

4、象山“村民说事”经验的新时代现实意义。“村民说事”在象山县乡村治理中产生了实效。“2018年全县以发展为主题的说事会3000余次，参与村民近4万人次，县镇村三级商议解决村民说事类事件8963件。镇乡（街道）的绩效评也把村民说事与集体经济、村庄环境、社会稳定、干部廉洁‘四张报表’考评相结合，群众对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满意度逐年上升，达到97.3%。”^⑥“村民说事”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基层乡村治理的总体要求，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责任，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新体系，很好地化解了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乡村治理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形成了可资借鉴的象山“村民说事”新经验。

（四）安吉“余村经验”

1、安吉县及余村的地理位置状况。安吉县位于长三角腹地，东靠莫干山，东南界杭州市，南依天目山主脉，西邻安徽省宁国市，北接太湖。安吉县是浙江省湖州市市辖县。余村位于安吉县天荒坪镇西部，该村是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①⑦}重要乡村发展理论的发源地。

2、安吉“余村经验”的缘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吉县余村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导引和促成了“余村经验”的形成和发展。近年来余村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为指导，坚持绿色发展、和谐发展、转型发展，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乡村治理的独特道路，形成了对全国广大农村开展乡村治理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价值的“余村经验”^{②⑧}。

余村总面积4.86平方公里，拥有6000余亩毛竹山和600余亩农田，行政上余村辖8个村民小组，280户农户，共计1050位村民。可以说，余村是典型的具有中等规模的江南村庄。余村通过坚持“两山”理论，行之有效地进行新时代乡村治理，多年来该村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乡村治理成效显著，村民安居乐业，村级集体经济充满活力，形成了一条可资借鉴的乡村治理经验。

3、安吉“余村经验”的发展和完善。“余村经验”从根本上在于坚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全面贯彻落实了党

^⑥ ②严红枫等. 浙江：呈现新时代乡村治理范本 [N]. 光明日报，2019—6—9（01）.

^⑦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38页.

^⑧ ②高清佳、尹怀斌.“两山”理念引领美丽乡村建设的余村经验及其实践方向 [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3），第15—20页.

的十九大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要求，把“三治”要求融会协同，融合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乡村治理经验。“余村经验”包含了“六个一”，即党建为引领，锻造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践行“两山”理论，找到一条适合村情的致富道路；事情商量办，形成一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信法不信访，坚持一个守法用法的基本理念；文明树新风，营造一个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管理精细化，编织一张灵敏高效的综治网络。在此基础上，余村总结形成了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的乡村治理经验，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乡村治理理念和党的十九大乡村治理要求落到了实处，产生了实效，结出了硕果。

4、安吉“余村经验”的新时代示范意义。余村是浙江省千百万个美丽乡村的典型代表和真实写照。因此，余村是鲜活的、可资借鉴的样板。

二、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特点

浙江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省份，浙江省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一系列典型性经验，为全国乡村治理做出了表率。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主要特点在于浙江省从上到下政治上的坚定性、治理上的创新性以及行动上的群众性。

（一）从上到下政治上的坚定性是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主要特点

政治上的坚定性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政治保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③浙江省从上到下从讲政治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全省乡村治理工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开创和总结形成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起到了政治保障作用。

筑牢政治底线，用讲政治来带动乡村治理工作，在浙江省从上到下是共识。在浙江，从省委省政府到市县乡镇党委政府，乃至到最基层的村级党组织，都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都能自觉做到与党中央及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政治上树立牢固的“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正因为此，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才得以形成。

在浙江，讲政治是一种高度自觉。浙江省委省政府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把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与高效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增强了讲政治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主动夯实基层基础，提高基层乡村治理能力，增强农村发展动力，从讲政治的高度创造性地形成了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同时，在浙江形成了上下同心、互动联动的乡村治理新形态。浙江省委省政府自觉向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从基层农村党组织开始，乡镇县市也自觉向党中央和省委看齐，主动与上级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形成了干事创业、上下联动的生动实践。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最重要的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基层农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作用，改变了村级党组织软弱涣散的状态，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所以才有了生动的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无论是桐乡的“三治融合”、宁波的“小微权力清单36条”，还是象山的“村民说事”以及安吉的“余村经验”，这些典型性乡村治理经验事例中，核心的内容都是基层党组织政治自觉性高起来了，战斗力才强起来了，从而带动乡村治理创出新水平，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先进典型。

在浙江，把讲政治融入乡村治理实践是一种内在需要。新时代全党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进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新时代乡村治理实际相结合，在大力增强“四个意识”的基础上，既坚守了“四个自信”，又坚决做到了“两个维护”，自觉地把讲政治融入乡村治理实践活动中，形成了通过做好基层乡村治理工作来反映政治站位的政治氛围，激发基层创新发展乡村治理的动力，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桐乡“三治融合”经验主动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通过“自治、法治、德

⁹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治”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进行三治融合，创造性地落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开创了乡村治理工作新局面。宁海“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则从基层农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小微权力入手，逐条厘清，件件落实，使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既杜绝了干部腐败，又增强了村民的监督知情力，加强了乡村治理的透明度和穿透力，落实了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形成了新时代农村新气象。安吉“余村经验”更是直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把绿水青山逐步变成了村民共同富裕的金山银山。所有这些都是浙江基层农村从政治高度开展乡村治理实践的生动内在需求，政治站位高是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政治保障与内在需求。

（二）从上到下乡村治理上的创新性是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重要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⑩创新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稳定至关重要。同样，创新在基层乡村治理中也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重要特点就表现在浙江广大基层乡村治理工作者创新精神的大力弘扬。只有创新，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在浙江基层乡村，创新成为一种需要。用创新的精神对待基层基础工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先进典型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是基层创新工作思路、总结新时代的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很好地诠释了浙江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做法，代表了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2013 年，伴随着新时代的脚步，桐乡市开始了县域改革的先行先试，以创新的精神探索出了“自治、法治、德治”的基层乡村治理新实践。桐乡“三治融合”经验是浙江省基层乡村治理的重要品牌，其创新性得到了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在 2017 年 10 月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得到了全党全国的高度认可。这种创新性的做法，是新时代基层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代表了和阐释了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创新性。

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在具体做法上的创新性，很好地体现在了以“一约两会三团”为重点的三治融合创新载体上面。所谓“一约”是指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让村（居）民参与制定、参与监督，以“村言村语”约定行为规范、传播文明新风，综合运用物质奖惩、道德约束等手段保障落实，使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发挥了更好的治理效果。如针对农村大操大办等不良风俗，崇福镇上莫村将结婚酒席菜品不超过 1000 元/桌等文明餐桌内容写入村规民约，并由村文明餐桌道德评判团全程监督，有效地规制了结婚过程中的大操大办，遏制了攀比风，形成了文明新风。所谓“两会”是指百姓议事会和乡贤参事会，由村党组织书记担任百姓议事会的召集人，由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乡贤参事会的秘书长，发挥乡贤的感召力，实现村事务的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如在屠甸镇荣星村火炉浜环境整治中，乡贤参事会会长带领乡贤带头出资，上门走访，说服村民共同支持环境整治，共同建设美丽乡村。所谓“三团”是指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百事服务团集成基层警务、水电维护、河道保洁、生活服务、便民医疗、法律顾问等服务，100 个法律服务团由法学专家、律师、政法干警及法律工作者等资源整合而成，道德评判团由社会贤达、德高望重老人、口碑良好的企业家等人士组成。以志愿服务、法律服务、道德评判为抓手，打造了新时代的党群服务中心，以服务为宗旨，全力在基层乡村治理中发挥服务村民和群众的积极作用。

（三）从上到下行动上的群众性是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鲜明特点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群众路线，党的工作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来源于农民群众，服务于农民群众，既充分体现了党的宗旨，又全面贯彻落实了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⑪在浙江，

^⑩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67 页。

① ^⑪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9 页。

无论是桐乡的“三治融合”经验，还是宁海的“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抑或是象山的“村民说事”，乃至安吉的“余村经验”，处处都体现着群众的高度参与热情，体现着群众的事情由群众商量着办，体现着党的群众路线的群众性。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有效地带动了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和参加公共事务，形成了“大家的事情大家干”的强大合力，有力地推动了广大乡村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村民幸福。

群众的事由群众参与管理和治理。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治，这是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基本点。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群众的高度参与性，换句话说，也就是群众性很强。单以“村民说事”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0 年来，‘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县 18 个乡镇（街道）、490 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召开说事会 10720 次，参与人次超过 50 万，该县绝大多数村民参加过一次或者多次说事会，参与到村里事物治理当中”^{②12}。同时，近年来“村民说事”的具体做法还下沉到基层网格、上升到微信网格群，发展出了“说事长廊”“说事亭”等新的形式和载体，方便了广大村民参与到“说事”和村务治理当中。

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鉴于广大村民的高度参与，在浙江乡村治理中产生了切实的效果。10 多年来，安吉余村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这些成绩的取得，依靠的就是党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如今的余村为村民提供普惠性的托底公共服务，涵盖了劳动就业、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等 13 项内容。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由 2005 年的 91 万元、8 732 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471 万元、44 680 元。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只有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引导广大村民群众参与到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中来，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稳固、农村美丽、农民富裕幸福。

三、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通过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夯实了农村的基层基础，通过提高基层乡村治理水平保障了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推动农业进步、农村美丽、农民幸福。

（一）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夯实了农村基层基础

党的基层组织是全党战斗力中最基础的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直接影响着党在基层农村的执政基础。浙江广大基层党组织在党中央、浙江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正确坚强领导下，通过积极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通过加强乡村治理，大大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创新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逐步推进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的战略工程。在浙江，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带领党员群众发扬创新精神，干事创业，开拓进取，加强乡村治理，通过充分发挥“三治融合”经验、“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经验、“村民说事”以及“余村经验”等的引领示范带动作用，建成了一大批“生态村”“民俗村”“花园村”“文化村”“小康村”等，有效地改善了当地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展示了浙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落实者。基层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的形成，直接体现了浙江广大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是强大的，是适应新时代乡村治理新要求的。在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新篇章过程中，浙江省牢牢紧扣乡村治理这个主题，充分发挥基层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和示范作用，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华章，发扬了基层农村党组织的创新精神，展现了基层农村党组织的强大战斗力，从而夯实了党在基层农村的稳定基础。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从桐乡“三治融合”、宁海“小微权力

② ¹² 2019 年 6 月 13 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村民说事”专题调研记录。

清单 36 条”，到象山“村民说事”、安吉“余村经验”等等，都蕴含着先行先试、分类探索、合力治理的创新性思路，形成了一大批可以观摩、学习、推广的乡村治理经验。这些经验当中包含着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都充分发挥了基层农村党组织的领导力、创新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充分发挥了基层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而使浙江农业强大、农村美丽、农民富裕，进而夯实了党在基层农村的执政基础。

（二）提高了基层乡村治理水平，保障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乡村治理不但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基层基础，而且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既是广大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重要保障，又是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现实基础。乡村治理在新时代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恰恰在提高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展现了其独特之处。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重在从当地实际出发，结合农村农民具体情况，开展了集群众性、创新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广大农民积极参与的乡村治理形式。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坚持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一切依靠村民、一切为了村民，形成了具有示范性、可借鉴性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经验和做法，为全国广大农村开展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可以学习和效仿的切实可行的农村治理经验。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大幅提高了乡村治理的现实水平，确保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乡村治理在农村促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乡村治理的核心在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乡村治理有效性一个明确的标准就是看是否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是否维护了当地社会稳定。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有效地促进了浙江当地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村庄环境美丽、农民富裕幸福。桐乡“三治融合”经验很好地诠释了通过乡村治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作用。乌镇在开展“三治融合”工作时，为了保持旅游名胜区的“本色”，志愿者建立了一支找“碴”队伍一起来找“碴”，让村民成为“文明旅游”的督察员，既为乌镇打造“中国旅游第一镇”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又促进了乌镇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率先试点“三治融合”工作的高桥镇，建立了“百姓参政团”，开门让百姓参政议政，发展了“百事服务团”，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成立道德评判团，把是非曲直交公众评判，“三团”配合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村的社会和谐稳定。

（三）助推了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农业进步农民幸福

新时代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治理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作从整体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和长远部署。乡村振兴战略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助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此，新时代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推进“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再上新台阶的有力抓手。党的十九大报告为我国广大农村描绘了这样的美好未来蓝图，就是要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了尽快实现这样美好的农村生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新时代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心内容和可靠抓手，可以说，乡村治理开展得如何，直接反映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具体状况。所以，浙江以新时代乡村治理为抓手，创新性开展了乡村治理工作，形成了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上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了更好地推进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浙江省委省政府已经在 2018 年 4 月印发了《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行动计划（2018—2022）》，高举乡村振兴旗帜，大力开启了新时代浙江“三农”发展建设的新征程。浙江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正聚焦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加强乡村治理，不断丰富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不断高水平谱写新时代全省“三农”工作的新篇章。

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全面小康社会。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高瞻远瞩，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做起，一点一滴，逐年积累，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能够对全国形成示范带动作用的乡村治理举措。在此基础上，多措并举，大力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逐步建设高水平现代化农业，推动农村全方位进步，农民逐渐富裕，物质、精神双发展，推动农民全面发展。可以说，新时代浙江乡村治理经验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方面起到了基础性作用。